2013 年第 4 期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No. 4 2013
总第 133 期　　JOURNAL OF 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Sum No. 133

·海外华人音乐研究·

意想不到的文化使者

——广东淘金客与中国音乐在新西兰早期的传播

宫宏宇

（新西兰 尤尼坦理工学院）

摘　要：中国音乐文化在新西兰的传播经历了五个阶段：1865－1900 为第一阶段，此阶段中国音乐的传播者为来新淘金的广东农民。1900－1950 为第二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华人社团的兴起与中华音乐文化的维持。第三阶段为 1950－1972，此间承担媒介作用虽仍是居新华人，但由于华人此间处于认同主流社会文化、被主流社会“同化”的时期，在年轻的华人中，西方音乐呈现出取代传统中国音乐之势，但粤剧仍为老辈华人所钟爱。1972－1987 为第四阶段，中新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仅为中华音乐文化在新的传播开拓了官方的渠道，也为新西兰音乐家了解中国音乐提供了机会。从 1987 年至今为第五阶段，此阶段的特点是大量华人移民的融入。新移民潮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的勃兴为中华音乐文化在新西兰的传播提供了多种渠道。文章将以广东淘金客为焦点，叙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早期在新西兰南岛奥塔哥地区的传播。

关键词：广东淘金客；新西兰；南岛；广东音乐；当地社会

DOI：10. 3969/j. issn. 1008－7389. 2013. 04. 002

中图分类号：J609.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89（2013）04－0017－05

引　言

“中国音乐在海外”是个较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中国音乐在欧美及大洋洲诸国的流传和研究，因为语言和原始资料的问题，较少有人涉及。即使有人涉及，其研究在资料的运用上，也多采用翻译过来的二手资料。[①] 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也相当陌生。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利用留学和居住在海外之便，开始利用西文原始资料，但该类学者多来自非音乐界。真正能像钱仁康、廖辅叔等学者那样能利用西文原始资料并融合当今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研究者屈指可数。

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在明代以前主要局限在我国的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等地。而欧洲人对中国音乐的介绍、研究和传播最早则可追溯到 16 世纪中叶。中国音乐在新西兰的传播除了在时间上较晚外（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传播途径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除了早期传教士、商人、旅行者的零星介绍外，最早的是伴随着华人（绝大多数来自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广东淘金客）的足迹，从社会最底层开始，传播的主要乐种为广东音乐和粤剧。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新西兰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1865－1900 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中国音乐的传播者为来新西兰淘金的广东农民，他们用来自娱的广东

收稿日期：2013－07－23

基金项目：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10JZD0011）。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男，新西兰籍华人，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高级讲师，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海外汉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国音乐史研究。

① 如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1994 年；毕明辉：《20 世纪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年。

民间音乐使新西兰南岛的民众第一次体验到了中国的音乐文化。1900－1950 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华人社团的兴起与中华音乐文化的维持。第三阶段为 1950－1972 年，此间承担媒介作用虽仍是居新华人，但由于华人此间进入认同主流社会文化、被主流社会“同化”的时期，在年轻的华人中，西方音乐呈现出取代传统中国音乐之势，但粤剧仍为老辈华人所钟爱。1972－1987 年为第四阶段，中新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仅为中华音乐文化在新西兰的传播开拓了官方的渠道，也为新西兰音乐家了解中国音乐提供了机会。此间传播中华音乐文化最尽力者也最有效者是新西兰作曲家杰克·鲍地（Jack Body，1944－）②。从 1987 年新西兰开发移民至今为第五阶段，此阶段最大的发展是大量华人移民的融入。新移民潮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华音乐文化在新西兰的传播提供了多种渠道。

本文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新西兰的传播与推广”系列论文之一，其焦点为 19 世纪下半叶广东淘金客及其在新西兰南岛的音乐活动。除钩沉中国音乐在新西兰的肇始外，还将就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新西兰早期的传播、传播途径、所传内容、传承场合以及当地民众对中国音乐的反应做一简单叙述。

一、新西兰、华人、中国音乐

在叙述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新西兰传播的历史、过程、传承者及其所传播的具体内容之前，似乎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新西兰的历史及概况。新西兰是位于太平洋西南端的一个面积为 27.05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由北岛、南岛两大岛及附近一些小岛组成，海岸线长达 1.6 万公里。西隔塔斯曼海与澳大利亚相望，北邻汤加、斐济，扼南太平洋的海、空交通要冲。虽说现在是以英国人后裔为主，通用的语言为英语（毛利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在宗教信仰上，居民多信奉基督教，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新西兰是毛利人（Maori）传统的氏族社会。最早（1642 年）发现新西兰的是荷兰航海家亚伯·塔斯曼（Abel J. Tasman，1603－1659）。但他对此地并未注意，荷兰政府亦未加过问。1769 年，由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带领的船队在新西兰登陆，并勘定了新西兰的地形。此后，大量的移民移入，到 19 世纪中期，新西兰已成为“典型的移民社会，人口组成，除了欧洲人及南太平洋群岛原住民外，便数华人人数最多”[1]12。1840 年 2 月 6 日，毛利人通过与英国王室签约，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新西兰人享有英国公民的权利。1907 年成为自治区，1947 年完全独立，但与英国保留有特殊关系，与已经独立的前英帝国殖民地国家或附属国一样，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新西兰的国土面积虽和英国及我国广西省的地域差不多，但人口稀少，据 2013 年 7 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新西兰现仅有人口不到四百五十万①。

新西兰与中国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 18 世纪 70 年代初，[2]1 中国与新西兰间的贸易往来也早在 18 世纪末就开始了，19 世纪初广州和澳门甚至成为新西兰的第一个海豹皮市场。[3:12,4:128] 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经贸往来虽然很久，但华人旅居新西兰的历史却并不长，只有 150 多年，[2]2 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只有零星几个华人进入新西兰本土。近年来，随着移民政策的放宽，亚裔人口虽然相对来讲有所增加，但华人也仅有十四万多，是新西兰总人口的 3.4%（据 2006 年人口普查数据）。

二、最早的传播媒介——广东珠江三角洲淘金客

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新西兰的传播与推广可追溯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最早的传播者是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华工。[5]4 1861 年新西兰南岛中南端的奥塔哥省发现了金矿，华人闻讯来此地掘金的人士开始增多。1881 年华工人数最多时达到 5，004 人。[6]7 与 19 世纪中期“淘金热”时赴美国、秘鲁、澳大利亚的华工不同，1865 年 12 月最早来新西兰的 12 名华工是应但尼丁商会的邀请，从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金矿区来再挖掘已被白人开采过的矿区的。之后才有一些直接来自广州东南的新会、开平、台山、恩平、澳门以北的中山、广州市以北的

① 截止至 2013 年 7 月 23 日，新西兰共有 4，471，158 人。此数字来自 Statistics New Zealand 官方网站，2013 年 7 月 22 登陆：http：//www. stats. govt. nz/tools_ and_ services/population_ clock. aspx。

番禺及西北的增城等县，也有些是来自广东宝安和惠阳县的客家人。虽然华工间包括少数福建人，但广东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早期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也有局限，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聚集在南岛南端的奥塔哥省和南岛的西海岸地区。华人淘金客的到来，不仅为新西兰经济增长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新西兰南岛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增添了色彩。中国音乐——更具体地来说应是广东的民间音乐——就是在这时通过华工进入到新西兰的。虽然他们的音乐活动主要是为了在辛苦劳作之后自娱，但通过与当地社团有限的互动，他们也将中国的音乐文化展示给了新西兰南岛的民众。

三、传播途径

目不识丁的早期的华工是如何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呢？其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在春节联欢会上表演。来自广东的淘金者虽没有能力将中国的音乐文化系统地介绍给新西兰人，但是他们通过节日庆典(特别是春节联谊活动)、公益事业及自我娱乐等渠道也起到了传播中华音乐文化的作用。见诸于文献记载的华工在新西兰早期的生活就多提到华工的音乐活动。目前所发现的最早有关华工活动的记载，就包含关于华人淘金客春节庆典活动中所进行的音乐活动及其利用音乐媒介与当地民众互动的报导。如在一篇刊登于1872年2月15日当地《Tuapeka时报》的报导中，记者就提到当地的华人淘金客和华商一连几天都在进行的体育、烟花爆竹和音乐表演活动。该记者还注意到华工不仅利用音乐自娱，还通过音乐与当地民众互动。中国乐队不仅为前来参观的客人演奏中国音乐，他们的歌手还不时为他们“演唱中国歌曲”助兴。可见这些贫贱的淘金客的音乐活动从一开始就起到了传播中国音乐文化的作用（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在自己欢庆的同时，还豪爽地“邀请了数位欧洲人士”到他们的营地“与他们同餐共饮”，一起观赏烟花爆竹。[7]221

也许是这一成功，使得早期的华工体验到了与当地社会交流的必要。从1872年到1893年，每年一度的春节庆典就成了华人展现文化的最佳机会。[8]2 此外，与当地民众联欢也成了他们传播中国音乐文化的有效的渠道。他们的表演除了齐奏、独唱，还有独奏。如在1873年，一位黄姓男子就为当地的听众表演了“一首二胡独奏曲，并高歌一首”[8]3。

除了在节日联欢上占据重要位置外，音乐活动也是此期间华工同胞间寻求慰藉缓解乡愁所必需的手段。南岛地方小报《艾达山纪事》（*Mt Ida Chronicle*）1882年11月18日的一篇报道就提到在一个叫“威尔士人沟”（Welshman's Gully）的镇子里，有一个华人开的店铺，星期天总“有二三十个天朝人［华人］在里面抽大烟、拉胡琴、玩（番摊）自娱”[8]3。迟至1892年6月，还有华工固定光顾华人在普里茅斯开的客栈，除了吸食鸦片和吃顿晚餐外，有机会来听每星期天晚上由中国乐队演奏中国的音乐也是他们光顾该店的原因之一。[9]60 除定期光顾华人开的店铺外，散居在各地淘金客也把操琴弄曲当作纾解孤寂与乡愁之苦的重要手段。据华工事后回忆：“在淘金的全盛期，很多中国淘金客常常是散居在各地，一般是四到十二个人一伙掘金。在漫长的冬夜里，他们会聚在一起回忆或讲述传统故事。如果有人带乐器来，如竹笛、三弦或月琴，他们还会奏一奏中国的乐曲、唱唱歌。”[9]116 他们这样的音乐活动虽然不是面对当地民众的，但还是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从而也间接地传播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如早期在华人淘金客间传教的唐原高牧师（Alexander Don，1857－1934）1891年在奥塔哥圆山（Round Hill）华工淘金场传教时，就注意到华工居住营地的“墙上挂有吉他［月琴］、提琴［二胡］，［华工］低声吟唱着下流淫荡的小曲”[8]3。

早期的华工经常受到欧裔人的歧视，早在1871年间，在华人仅占当时全新西兰人口1.75%时，排华情绪已见端倪。自1880年代后，金矿的衰竭导致新西兰经济萧条，华人更成为替罪羊。不仅淘金场上华工的勤劳高效引起当地白人同行业者的不安与抵制，新西兰政府也屡屡颁布种族歧视性法规（如对华人征收人头税、进口税、阅读测验等）试图限制中国移民。[10]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新西兰南岛淘金的广东华工仍试图用音乐为媒介，与当地的民众打成一片。如在1886年春节，一位颇为成功的华商甚至组织了一场中西合璧的音乐会，于2月13日在克伦威尔当地的会堂上公演。这场包括中国打击乐、吹奏乐、管弦乐及克伦威尔当地铜管乐队在内的音乐会极为成功。[7:225; 8:2]

华工通过在公共场合表演的音乐节目为当地公

益事业募捐也起到了传播中国音乐文化的作用。从 1873 年开始，华工所居地的报纸杂志就开始有华工为赈灾（如矿难、泥石流）、筹建公共设施（如医院、图书馆）、扶贫救孤募捐而演奏二胡、清唱的报道。[9]169 当地各类的民间社团也意识到华工的文艺表演是他们得到捐助的有效途径之一。如早在 1875 年 7 月，南岛普里茅斯文学社在为该社举办募捐活动时，就邀请了能歌善唱的华工和欧裔移民一起义务献艺。[9]169 以上提到的中西合璧的音乐会影响大不算，在经济上也收益颇丰。但最令当地人刮目相看的是，在新西兰南岛淘金的广东华工虽然赤贫，但他们还是将这场音乐会所得到的收入全部捐给了当地的慈善机构。[7:225;8:2]

在淘金华工聚居的劳伦斯（Lawrence）地区也不乏华人音乐人才，他们也一样热心公益事业。据报道，他们还专门从中国进口了一批中国乐器，为的就是日后再举办类似的活动。《Tuapeka 时报》1886 年 4 月 17 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就报道说：“一旦新乐队成员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他们将会很乐意协助或提供任何与公益事业的娱乐。”[8]4 但由于后来排华情绪愈演愈烈，广东华工主动提出的为社会义演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11]294 即使是在华人最受歧视的 1900 年，当地报纸也还有“八名华工乐手为当地的教堂献艺募捐”的报道。[9]169

四、传播内容

从当地报纸历年来有关广东华工新年庆典、公益事业、自我娱乐活动的报道中，我们不但可以得到华工音乐活动的诸多例证，还可获取他们早期音乐活动中所使用的乐器、所表演的曲目、所采用的表演形式、所用音乐的具体场合以及当地观众对他们表演活动的反应等信息。通过阅读这些报道，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他们所用的乐器不仅有广东音乐常用的二胡、三弦、月琴、阮、琵琶、唢呐、笛子等常规乐器，还包括锣、鼓、镲等打击乐器。如在一篇刊登于 1872 年 2 月 6 日的《Tuapeka 时报》的报导中，记者就提到：

> 中国城春节庆典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一些天朝人对声乐和器乐的偏好。他们所用的乐器中，有与古希腊人所用的 kithera 相似的乐器，所奏出的曲子有时与苏格兰高地的风笛所发出的音调惊人地相近。他们演奏的一些较简单的曲调与苏格兰高地人的双人对舞曲也没有什么不相似的。[7]222

对新西兰华人史最有研究的伍德明（James Ng）医生的研究也证明，早在 1880 年奥塔哥省的劳伦斯地区就已有华人小乐队的存在，这些乐队至迟在 1888 年还在本地表演。[8]4 近年来对早期华工活动研究颇有成就的朱莉娅·布苒德绍（Julia Bradshaw）也在她的著述中提到华人乐队在新西兰南岛西海岸格里茅思地区的活动情况。她特别注意到当地的报纸从 1884 年起就开始有关于中国乐队的零星报道。[9]60,112 虽然他们演奏的具体曲目已不可考，但当时所用的一些乐器，有一些还是被保存了下来。如当年曾住在奥塔哥金矿华工营地隔壁的格罗姆·辛克莱尔（Graham Sinclair）在华工离去后就搜集了一些华工用过的乐器，现已为惠灵顿 Te Papa 国家博物馆收藏。[8]4 其中的几件（三弦、二胡、琴弓），还于 1998 年在新西兰 Te Papa 国家博物馆开幕时展出。此外，南岛小镇劳伦斯信息中心的博物馆也保存着华人淘金客留下的一件打击乐器。[7]230-231

从当地报纸历年来有关华工娱乐活动的报道中，我们也知道他们所演奏的乐曲及歌曲不仅有广东音乐和民歌，还包括戏曲唱段。他们所采用的表演方式也多种多样，独唱、独奏、伴唱、清唱、合奏应有尽有。他们展示中国音乐的场合包括节日庆典、募捐、同胞聚会等。此外，通过报刊报道，我们也可窥见对当地人聆听中国音乐时的反应。[7]222

结 语

进入到 20 世纪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新西兰的传播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这时期，起着媒介作用的虽然仍是华人，但在传播的方式及传播范围上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新西兰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极度歧视、新西兰政府自 1880 年代后实施的一系列排斥华人的措施，以及奥塔哥省金矿资源的枯竭，华人在新西兰的人数从 1880 年代后就开始下滑，到 20 世纪初，华人总数已从 1881 年高峰期的五千多人锐减至 2,570 人，仅占新西兰当时总人口的 0.289%，[1]177 到 1916 年，更跌至 2,012 人。[6]8 在所工作和居住的地域上，这些华人已不再聚居在偏远而崎岖的南岛奥塔哥中部，而是流落到南北岛各大城市如但尼丁、惠灵顿、奥克兰等城市及其附

近的郊区。在心态上，此间华人多持过客心态，新西兰不过是暂时栖息之地而已。华工人数的减少和离散，以及没有稳定归宿感的过客心态也影响了中华音乐文化在新西兰的传播。由于社会上弥漫的反华浪潮，华人也不愿意过多地彰显自己的中国特性。力求远离主流社会，自成独立的华人社区，建立自己的社团和组织系统。以往得以展示中国音乐文化的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重阳节、清明节、中秋节等过是要过的，但不再张扬，而是由社团举办，一切都控制在华人圈子内。与之有关的音乐活动也不再像先前在南岛淘金地那样那么活跃。报章杂志上几乎难得见到有关华人音乐活动的报道。[12]51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音乐活动的完全终止。[13]这期间华人的音乐活动的总体特点是文化维系大于传播，演艺活动多限制在华人圈内，由华人社团组织。其传播渠道主要是：隶属于社团的音乐组织、华人教会属下的中文学校和青年俱乐部、音乐爱好者（主要是粤剧爱好者）自己成立的音乐社团、国庆日的庆典活动。

参考文献：

［1］叶宋曼瑛．也是家乡［M］．香港：三联书店，1994.

［2］Zhang Beihua. *Sino – New Zealand Relations* 1792 – 1987［D］. University of Waikato, 1988.

［3］Belich James. *Replenishing the Earth: The Settl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nglo – World*, 1783 – 1939［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4］Belich James. *Making Peoples: A History of the New Zealanders from Polynesian Settlement to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Auckland: Penguin Books, 2001.

［5］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新西兰华侨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6］Ng James. The Sojourner Experience: 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in New Zealand［G］//Manying Ip. *Unfolding History, Evolving Identity: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3.

［7］Johnson Henry. Performing Identity, Past and Present: Chinese Cultural Performance, New Year Celebrations, and the Heritage Industry［G］//Charles Ferrall, Paul Millar and Keren Smith. *East by South: China in the Australasian Imagination.*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8］Ng James. Chinese Music Making in Early New Zealand［J］. *The Ritmico Journal*, 2011 (88&89): 1 – 4.

［9］Bradshaw Julia. *Golden Prospects: Chinese on the West Coast of New Zealand*［M］. Greymouth: Shantytown, 2009.

［10］Ip Manying, Murphy Nigel. *Aliens at My Table: Asians as New Zealanders See Them*［M］. Auckland: Penguin Books, 2005.

［11］Ng James. *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M］. Dunedin: Heritage Books, 1993.

［12］Ng Bickleen Fong.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A Study of Assimilation*［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9.

［13］Ng Siong Ng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uckland: A Musical Ethnography and Music History*［D］.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00.

【责任编辑：吴志武】

The Unexpected Cultural Ambassadors: Chinese Gold Miners and Music Making on the Otago Goldf Mines of New Zealand

Gong Hong – yu

(Unitec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ew Zealand)

Abstract: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ese peasants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travelled to New Zealand to work on the Otago gold mines. They brought with them Cantonese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used them as a means of entertainment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engaged with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usical activities of Cantonese gold miners and their unrecognized role in introducing Chinese music to New Zealand.

Keywords: Cantonese gold miners; Chinese music; New Zealand; Otago